史事考证

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英属印度事件考辨

周　源

1910年2月12日，在中国西藏地区发生了一起为国人关注并牵动国际视听的事件——因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而被迫流亡祖国内地达五年半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尚不足两月，又因与清政府及其驻藏大臣交恶而再度出逃。此一时，彼一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次是南逃英属印度，投靠、乞助于他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

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英属印度是西藏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对当时西藏的政局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且对此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地方的历史进程产主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惟其如此，治西藏近代史者无不关注这一事件，分析、研究这一事件的原因、影响等。

笔者近年多方搜求、反复研判与十三世达赖逃亡英印事件有关的史料，努力考究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渐感——就管见所及——以往论著对十三世达赖逃亡英印事件的研究多有不足，失之于就事论事地叙述事件的过程，未深入分析、把握这一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而过于简单地认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办理不善，入藏川军军纪败坏，骚扰地方，甫抵拉萨即开枪伤人，致使十三世达赖担心自身安全而被迫潜逃。对于此说，至今未见有人献疑，而笔者则不敢苟同，并愿不揣浅陋，就研究所得刊布一孔之见，就教于学术界的师友同好。

一

要弄清十三世达赖与清政府交恶并被迫南逃英印的原因，必须从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西藏的形势，以及以张荫棠使藏为开端，清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新政说起。

作为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的直接后果，英国远征军迫使西藏噶厦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拉萨条约》。当时清政府认为此约损害中国主权太甚，遂电示驻藏大臣有泰不得在该约上签字；同时与英方交涉，另派唐绍仪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方谈判修约。因英方态度蛮横，毫无改约之意，谈判久无进展。1905年9月，唐绍仪因病辞职回国，随团参赞张荫棠奉旨继续主持修约谈判。

作为出使欧美多年、熟悉国际政治而又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操的政治家，张荫棠在谈判桌上与英人周旋，折冲尊俎，力挽中国在藏主权的同时，忧虑地注视着藏中事态的发展，密筹摆脱西藏危机的方略。

早在十八世纪末，清政府挟“康乾盛世”的余威，调遣大军入藏，一举击退入侵后藏的廓尔喀军，并乘势整顿藏务，革除积弊，制定、颁布了著名的治理藏务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此举是有清一代中央政府治

[收稿日期] 2000—03—20
[作者简介] 周源（1948—），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101

藏的大手笔，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统治达到全盛时期。然而，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清朝从盛极一时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内外交困，日趋衰败，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的对象，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也开始走下坡路，愈益疲软乏力，而西藏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日渐抬头。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愈发托大，对朝命阳奉阴违，视驻藏大臣如弁髦，桀骜不驯，威福自专，在一系列内外重大事件上罔视国法，独断专行，我行我素。而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被中央政府赋予在藏最高权力的驻藏大臣则有令难行，有禁难止，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专擅自为一筹莫展，坐困愁城。诚如赵尔丰所言："自乾隆用兵之后，西藏百余年太平无事，以致养成达赖之骄，不知国恩，遇事要挟。"①

张荫棠在加尔各答谈判时也观察到："现在藏中情形，驻藏大臣虽拥尊号，而举办一事，藏番外示诚朴，阴实抗违。近年藏中内政外交，驻藏大臣不得不以开导为词，诚实情也。"②十三世达赖的离心倾向，"予外人以可乘之隙。"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长期觊觎西藏的沙俄政府利用十三世达赖的离心倾向和仇英情绪，对他多方拉拢诱骗，企图把西藏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进而挑战英国在南亚的霸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英国不惜以兵戎相向，回击沙俄的挑战。昧于外情而又妄自尊大的十三世达赖鲁莽灭裂，轻于一战，结果兵溃千里，拉萨沦陷，自己也被迫出逃。其恶果是，英国通过新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西藏地方的大量权益，使西藏成为英国的独占势力范围。

印度密迩西藏，英印政府熟稔藏中形势，洞悉西藏太阿倒持，"驻藏两大臣，徒有办事之名，几同守府，已为藏人所轻视。政权多出藏僧之手，遇事掣肘，莫能过问"④的情况，遂直言不讳："藏事与中国交涉十余年，订有约章，中国遇事诿藏，未能尽主国义务，徒托空言。我英自应实行政策，与藏直接。"⑤英国的所谓"直接"政策，就是利用十三世达赖疏离中央、架空驻藏大臣的局面，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绕过清中央政府而与西藏地方实力派人物直接打交道。英国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实行"直接"政策的对象不再是因抗英亲俄而外逃外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而是有亲英倾向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教授依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撰文揭露了从1905年上半年到1906年初，即张荫棠在印谈判期间，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不和，为争权夺利，扩张实力，主动向英人乞援。英印政府则把握这一契机，策划、诱骗九世班禅以会晤英王太子为名赴印，拉拢、控制班禅，排斥达赖，进而控制和分裂中国西藏。该文推翻了史学界相沿已久的所谓九世班禅赴印系英人"兵威迫胁"之说，廓清了历史的真相⑥。英印政府与九世班禅的接触极为秘密，并为掩盖真相而施放烟雾，所以张荫棠当时不可能尽知这一阴谋的底蕴，但他仍通过自己的情报渠道"探闻印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自主，归英保护。俟回藏将中国不能治藏，令藏不能不图自治情形宣示全藏，以成独立。英人谓班禅将来不免举兵驱杀汉官。又谓见班禅意气自大，有心向英。"⑦

接悉密报，张荫棠大为震惊。二十世纪初，英、俄争夺中国西藏的斗争十分激烈，而西藏地方的两大实力派人物，一个投俄不成而滞留外蒙，一个又因附英而南来印度，于西藏危局雪上加霜。1906年1月7日，张荫棠急电北京外务部，痛陈："英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怂令班禅回藏，滋生事端，英藉保护进兵，则全藏危矣。若待变象已见，即百计补救亦属无济。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⑧同电，张荫棠就整顿藏务提出如下建议："拟请奏简贵胄总制全藏，一面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我国派员经理，并次第举行现办新政，收回治权。其达赖班禅等，使为藏中主教，不令干预政治。"

张荫棠的建议言简意赅，切中要害。针对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在藏军政力量衰微，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自外生成，导致列强窥伺、外患不已的严重局面，张荫棠强烈要求清政府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速派重臣、精兵入藏，加强中央政府在藏的军政实力，以"收回治权"，

即恢复和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治权，为在西藏推行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政教分离”，结束十三世达赖等大活佛利用其宗教地位把握政权而恣意妄为的局面。

张荫棠“政教分离”、“收回治权”的主张，旨在适应西藏内外条件的变化，对此前一百多年间清政府实行的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治藏方针进行重大调整。显然，张荫棠的主张得到清廷的激赏。不久，清廷打破自清初设置驻藏大臣以来，历任驻藏大臣均由满族或蒙古族官员担任，而从不任用汉员的定例，旨派张荫棠以候补五品京堂并赏给副都统衔赴西藏“查办事件”，令其于“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随时详晰具奏。”[9]

张荫棠入藏后，耳闻目睹，对“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以致“达赖丑诋（驻藏大臣）为熬茶大臣，日形骄蹇，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废弃”[10]，遂使中央对西藏的统治被消弭于无形的局面痛心疾首，“深知藏事，非大为更张，不足挽危局也。”[11]于是，他雷厉风行地整饬吏治，参革、处分了以驻藏大臣有泰为首的一批昏庸误国、劣迹昭彰的官员，藏中人心为之一振。由此，中央政府的形象得到改观，权威得到恢复，治权得到加强。

张荫棠在藏期间，于西藏兴革殚心竭虑，擘画周详，令人耳目一新。而其要旨，仍一秉初衷，在“政教分离”、“收回治权”上。

1907年2月25日，张荫棠上外务部《收回政权经营西藏条陈》[12]。其第一条就是“拟达赖、班禅优崇封号，厚给廉俸，如印度各藩王之制。照旧复立藏王体制，视达赖专营商上事宜而以汉官监之。”第二条为“拟请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或就国，或遥领，恭候圣裁。体制事权一如印督之王礼，则主国名义已不言而自定矣。另设会办大臣一员，统制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其亚东、江孜、札什伦布、阿里、噶大克、察木多、三瞻、三十九族、工布、巴塘等处，酌量设道、府、同知，均用陆军学堂卒业生督率番营官治理地方，兼办巡警、裁判，均优给廉俸。查番营官分治内地之州县，每有番官之地，应各设一汉官以资控制。”

1908年1月13日，张荫棠查办事件完竣，向清廷复命，上《奏陈西藏内外情形并善后事宜折》。该折所附《奏拟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清单》[13]之第一条为“拟设西藏行部大臣以崇体制而重事权也”，内称“百年以来，驻藏大臣久已放失政权，非改革官制不足耸视听。拟将驻藏大臣、帮办大臣两缺裁撤，改设行部大臣，似宜特简亲贵或内外文武兼资大臣，畀以重权，便宜行事，以资镇慑。所有达赖、班禅等均归节制，以重事权而定主国名义。”其第二条则为“政权宜收回也”，主张对“达赖、班禅拟请赏加封号，优给厚糈，专管黄、红教事务。”

张荫棠不愧是有清一代历任驻藏官员中眼光最为宏大、最有作为的佼佼者，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政教分离”为前提，以“收回治权”为中心，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提出全面整顿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方案，堪称清末西藏新政的设计师。尽管张荫棠整顿藏务的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措施并未为清廷及驻藏大臣联豫所接受，或未来得及实行，但其核心思想，即“政教分离”、“收回治权”，则被清政府所采纳，成为辛亥革命前几年清政府治藏的基本方针并逐步付诸实施。

二

正当张荫棠、联豫等在西藏紧锣密鼓筹办新政的时候，十三世达赖喇嘛却处于有家不能回的窘境。

十三世达赖1904年6月15日逃离拉萨后，于当年10月20日抵达外蒙古首府库伦。但客居他乡终非长计，史载，“开始外蒙法王哲布尊丹巴非常尊敬达赖，但后来看到外蒙人民对达赖的信仰超过了他，心中感到不快，逐渐对达赖有了厌恶之感，想使达赖离开外蒙。由于达赖与哲布尊丹巴之间发生失和现象，更促使达赖想早一点返回西藏。”[14]十三世达赖于1906年4月离开库伦，9月抵达西宁，准备由

此返藏。

英国与十三世达赖积怨甚深，担心他回藏后仍竭诚为俄国人效劳，推行违背英国利益的政策，明确反对达赖返藏。1906年3月13日，张荫棠奏称："印陆军总统与棠私言，达赖通俄，我英自有办法。韩税务司探称印政府派前经入藏之马敦和，日间赴藏察勘进兵路途，似此情形，英人进取之心日决。拟请设法阻止达赖，勿令回藏。"⑮10月29日，张荫棠致电外务部称："班禅与达赖仇隙已深，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借端构衅……现值埠事未妥，春丕兵未撤之时，可否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全局。"⑯次年5月31日，张荫棠又电北京外务部，告以与其谈话之英陆军总统吉治纳表示，"俄人所派多哲夫（即德尔智）与达赖私通，甚为秘密，贵国应将达赖监禁。"⑰清廷从张荫棠请，旨令十三世达赖留驻青海塔尔寺，暂不返藏。

既然令十三世达赖有家不能回的阻力来自英国，如何修好英人，便成为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于是，他在赴京觐见途中遣使赍书往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问候"。当朱尔典责难到："一九零四年双方好关系之破坏，实系历来误会之结果，而此种误会，又多于达赖主持藏政时发生"时，来使诚惶诚恐地解释："过去误会悉因达赖左右多方蒙蔽，以致本人不能明了事实真相。今达赖一切恍然，深愿回去以后，对于壤土密接之英印度诚意修好。"⑱

十三世达赖1908年9月28日抵京，9月30日就迫不及待地"遣密使走候朱尔典，约期会晤"。10月20日，达赖在与朱尔典会晤时，当面向英方道歉，表示："过去发生不幸之事变并非本人初意，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请朱氏将此意代达英皇云。"⑲

十三世达赖喇嘛离京前一日，再次派员向朱尔典赠礼辞行，"云达赖及其从人此番入觐结果，已得到良好之教训……确信此后只要藏方能确守条约，则藏印之间必可保持友谊，此实达赖入京以来最有价值之成就也。又云达赖初意原欲派员留驻此间俾与英使经常接洽，但为尊重中央政府命令起见，暂罢此议云。"⑳

十三世达赖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向英人示好，极力开脱自己在1904年抗英战争中的责任，出卖了服从他的命令走上抗英战场、不惜付出生命的数千藏军官兵，就是为了换取一张英人允许他回藏的"通行证"。十三世达赖对英人前倨后恭，堪与慈禧太后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表现媲美，可谓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封建顽固派有时也会摆出抵御外侮的爱国姿态，但他们大多是顽而不固，一遇挫折，就会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向洋人摇尾乞怜。十三世达赖的所作所为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十三世达赖刚刚解决了有家不能回的难题，又一个有家难回的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

在西藏办理新政的张荫棠、联豫等痛感中央政府在藏军政实力孱弱而政令难行，认为"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不可"，多次奏请清廷调派重臣、精兵入藏。清廷从其请，于1908年3月9日任命在川边大刀阔斧地改土归流而政声日隆的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后又令知府钟颖率四川新军入藏。十三世达赖长期流亡在外，但仍可利用其地位、影响，随时掌握藏中动态。当他得到赵尔丰任驻藏大臣和川军即将入藏的消息后，本能地感到来者不善，将对自己返藏后的政治权力、地位构成重大威胁。于是，他罔视国法，未经清帝御准，不顾驻藏大臣联豫的反对，擅令已被革职的噶伦边觉夺吉、彭错顿柱、喇嘛济汝白桑"私入公所主持一切"，强行把持噶厦政权。边觉夺吉等惟达赖之命是听，一方面假冒民意，联名上书，诬称赵尔丰入藏，"势必仇杀喇嘛，毁坏寺院，遂与教无益，与国亦无益"㉑；一方面向川藏交界地方调动军队，以武力阻挠赵尔丰进藏，在对抗中央政府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据现有材料看，如果说，十三世达赖入京觐见前，已对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剥夺他的世俗政治权力的迹象有所不安，但尚带有猜测成份的话，那么，入京觐见后，这种猜测便得到了证实。

达赖到京后，清政府派理藩部侍郎达寿和时已在京的外务部右丞张荫棠负责招待事宜。张荫棠从清政府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收

回治权”的需要出发，提出，此次十三世达赖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不必拘牵五世达赖觐见清帝旧制，对其“赏赉不妨优隆，体制亟应裁抑”，“必折其骄蹇之气，乃能就我范围”。他还建议，“(达赖）如提及一切政务，拟奏请谕以汝是出家人，以清静为主，应遵守历辈达赖宗教，专理黄教事务，凡内政外交一切事宜，有驻藏大臣自能妥慎筹办。”[22]

清政府采纳了张荫棠的建议，未按五世达赖入京旧例接见十三世达赖，令其陛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时行跪拜礼。陛见后，清廷加封十三世达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年赏廪饩银一万两，但对达赖陛见时所提出的“西藏事务重大，事事均要通过驻藏大臣，每多误事。今后可否由达赖遇事直接向清朝皇帝上奏，勿须通过驻藏大臣”的要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当时未作答复，后由理藩部书面通知达赖：“奉上谕，达赖喇嘛于万寿节，执礼甚恭，殊堪嘉奖。回藏以后，更望恪遵主国典章，所有事务，毋庸直接奏明皇帝，具报驻藏大臣请其代奏，静候敕裁”[23]，拒绝了达赖的请求。

十三世达赖对此不满，亦心有不甘，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再次向清政府作一试探，于1908年12月3日呈递奏折：“卑达赖喇嘛此次来京陛见，叠蒙厚恩，惟有吁恳天恩，敕准奏事”，“嗣后遇有番服一切要件，恳准卑达赖喇嘛自行具奏或与驻藏大臣会衔具奏，以固边疆，而期敦睦番汉。此禀本系依照陈例，并非新起意见。”[24]12月5日，他又呈递奏折，声称该“陈例”始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接奉敕书金册，著该达赖喇嘛如遇有紧要大事，准其专折奏事”，“以致第九辈（达赖喇嘛）凡有大事，照前具奏”，“今因为著汉番敦睦永远和合之事，为此恳请降旨允准施行。”[25]然而，对他的请求，清廷根本未予置理。

达赖之所以反复要求给予他向清廷直接奏事的权利，实为投石问路之举，本意是以此试探清廷是否承认他的西藏地方政治领袖地位，是否剥夺他的政治权力。现在，清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十三世达赖于12月21日满怀失望与不满离开北京。途中，他上书军机处，威胁说，如果清廷仍不批准他直接奏事的权利，那么西藏和清廷“势分彼此，将历代眷顾之恩付之东流。”[26]达赖已决心与清廷分道扬镳了。

遍数历辈达赖，尤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具有极强的权力欲和政治野心，堪称西藏历史上的一代枭雄。189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西藏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政治态度内向的原摄政第穆活佛，在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波诡云谲的残酷斗争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站稳了脚根，“威服全藏，莫敢有违”，成为名副其实的西藏地方政教领袖，从而初显终其一生的政治性格。清政府要在西藏实行以“政教分离”、“收回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政，意味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将失去其来之不易的世俗政治权力、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清政府仍将保留十三世达赖黄教“教主”的地位，但他却不能干预政治，只能终日枯守经堂，与青灯黄卷为伴。把持西藏地方政权多年、顾盼自雄、威福自专的十三世达赖岂肯俯首帖耳，束手就范，向清政府乖乖交权。一场激烈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在清政府与十三世达赖之间爆发了。

三

令笔者常感疑惑费解的是，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这些史料并不罕见——十三世达赖喇嘛1908年底衔恨离京后，踏上了与清政府彻底决裂的不归路。为了坚持政教合一制度，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力、地位，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惜铤而走险，乞援于英、俄等列强，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了反抗清中央政府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但前此论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孤立地看待十三世达赖南逃英印事件，把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入藏川军1910年2月12日在拉萨开枪伤人，而未看到这是十三世达赖叛乱失败的结果。

前文已述，早在入京觐见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指令不具合法身份的噶伦边觉夺吉等阻止驻藏大臣赵尔丰入藏，迫使清廷收回成命，致使藏方“以我意和平，不欲轻启兵衅，遂益加恣肆，愈怀轻藐之心。”[27]十三世达赖喇嘛于返藏途中，如法炮制，坚欲阻止钟颖统率的四

川新军入藏，以使清政府“政教分离”、“收回治权”的意图无法实现。

为了阻止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不惜求助于洋人，致电英俄等国驻华公使，“声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抗议，要求撤退川军”[28]，甚至要求廓尔喀王“出兵相助”[29]。与此同时，假借“西藏公会”名义致电北京外务部，威胁说：“如（清）政府不准联（豫）、赵（尔丰）及其兵士即行撤回，藏众必将反叛。”[30]并“阴派代本改桑坚参、硕第巴鲁朱、堪布降巴典等三人，潜运军械，在距察（木多）二站之恩达勒，调洛隆宗、硕般多、边坝各路之兵，屯聚数千人”[31]，为阻止川军入藏而不惜一战。

部署停当后，十三世达赖于1909年12月21日踌躇满志地回到阔别已久的拉萨。对于当时达赖有恃无恐的傲慢态度和拉萨叛乱的嚣张气焰，联豫在其奏折中曾作如下描述：“（达赖）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回藏，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护卫皆系马兵，执持快枪，导以号鼓，如临大敌。上山以后，奴才等订期往见，皆借故辞却。与其党边觉夺吉等，日夜密谋，赶造枪枝子弹，分路调兵。番官番民稍佛其意，立加酷刑，并欲将其举家投河，以故各番官皆不敢违。拉萨有五层楼，即乾隆十五年珠尔墨忒谋逆之所也，该已革达赖调兵千余人屯踞其内，于楼上竖狮形大旗。藏中又私设造币厂，所铸银钱、铜圆，两面印花，亦擅改从前定制，铸为狮形。又于拉萨市中遍设蛮兵，名为巡警，实以伺察汉人举动。凡番商皆禁与汉人交易，米粮、柴草概加限制。”[32]“番气骄横……喧言某日围攻奴才衙署，谋劫我营盘……情势岌岌可危。”[33]

然而，形势的发展给予十三世达赖当头一棒。1909年12月中旬，钟颖所率川军与赵尔丰所部边军分路锐进，数千藏军望风而逃，西藏门户洞开。接着，川军避实就虚，由类乌齐绕道三十九族地区，直指拉萨。而边军则沿硕般多大道挺进，遥为川军声援。藏东防线崩溃后，十三世达赖、边觉夺吉等又调集重兵，在江达汛构筑防线。藏军在江达汛“肆行抢掳，焚毁汉民房舍四百余家，杀毙台站汉兵民三名，又幼孩一名……在汛储备军粮，亦为灰烬。”[34]1910年1月31日，川军一举击溃江达汛藏军，复于2月9日攻克如陀寺，前锋部队于2月12日抵达拉萨。至此，十三世达赖发动的武装叛乱归于失败。

十三世达赖出于一己之利，对抗中央，发动叛乱，非常不得人心，“不惟藏中百姓不愿，即喇嘛亦多怨言，皆以与朝廷相抗为非”[35]。人数居拉萨三大寺之首的哲蚌寺“各堪布独能约束僧侣，表其恭顺。达赖唆使番官，百计诱令邦（帮］兵，该堪布等力斥其非，毅然却之。且时以番党阴谋密告（驻藏大臣）……因之色拉、噶勒丹（即甘丹寺——引者按）两寺僧众，遂亦多不附和（叛乱）”[36]。这是达赖煽动的叛乱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川军到达拉萨，使中央在藏的军政实力空前加强，十三世达赖见大势已去，被迫妥协，主动邀请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到布达拉宫面谈。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达赖面允三事：（一）将各处阻兵番众，立刻撤回。（二）渥贺朝廷封赏，咨请奏谢。（三）仍尊重联大臣，一切供应照常恢复。温宗尧欲安其心，亦允以四事：（一）川兵到日，自必申明纪律，维持安宁秩序，不至骚扰地方。（二）诸事均和平处理。（三）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害。（四）决不杀害喇嘛，以昭信守。”[37]联豫对温、达会晤结果表示不满，以为“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由温宗尧单衔印发。”[38]而更为不满的应该是十三世达赖，温宗尧只承诺对“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害”，“而于政权则未提及，关于此点，达赖亦曾提请驻藏大臣注意。”[39]可见，温、达会晤后，十三世达赖并未因川军大兵压境而放弃维护自己世俗政治权力的立场，导致十三世达赖与清政府交恶并发动叛乱的问题依然存在。双方的矛盾仍是如此尖锐而无法调和，必将继续严重影响西藏历史的进程。

那么，十三世达赖为什么要在温、达会晤的次日午夜匆匆逃离拉萨呢？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已无讨论的必要。为十三世达赖一方所刻意渲染，并为前此治西藏史者认定不疑的原因是，2月12日入藏川军在拉萨开枪伤人，十三世达赖因担心自身安全而出逃。人们忽略

了当天所发生的另一重要事件，而这一事件恰恰是促使十三世达赖出逃的直接原因。

荣赫鹏在其所著《英国侵略西藏史》中披露，十三世达赖亲口告诉英国驻哲孟雄行政官贝尔："当川军初抵拉萨之日（即二月十二日），达赖及其大臣三人方在布达拉宫举行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忽闻中国当局派兵十名往各大臣住宅搜捕彼等，又闻续有新兵千名已入拉萨境内，达赖暨各大臣遂决定出亡，是夕即离拉萨。"该书接着讲到，与达赖"同行者为噶布伦中各大臣，皆畏祸不敢回家者。"[40]据联豫《奏达赖喇嘛私逃情形并请将同逃藏官择尤惩处折》，随同十三世达赖出逃的主要官员是大仲译丹增汪布、噶伦边觉夺吉、噶伦彭错顿柱、喇嘛噶伦济汝白桑以及代本改桑坚参、硕弟巴鲁朱。[41]那么，这其中哪三个人是2月12日与达赖在布达拉宫开会，并遭联豫搜捕，以致"皆畏祸不敢回家"而星夜出逃的"三大臣"呢？道员罗长奇曾于1910年底奉命赴印劝说十三世达赖回藏，在其报告中提及："已革噶布伦边觉夺吉、已革噶布伦彭错顿柱、已革噶布伦济尔白桑，此三人者名曰大臣……均以已革达赖之名义与职道会商"[42]。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本文第二节所介绍过的，边觉夺吉、彭错顿柱和喇嘛济汝白桑是十三世达赖未经清廷批准，擅自任命的噶伦，他们是达赖的私党，是西藏叛乱的首恶分子，联豫对他们恨之入骨而又一时无可奈何。川军前锋部队刚到拉萨，联豫就立即下手，派兵到边觉夺吉、彭错顿柱、济汝白桑的住处进行搜捕。凑巧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布达拉宫，与十三世达赖研究温、达会晤后的对策。可以想象，他们听到这一消息，是怎样的大惊失色，感到大祸临头，遂匆匆做出连夜出逃的决策。如果不是联豫采取如此突然、迅猛的搜捕行动，仅仅因为川军入拉萨时与僧侣群众发生些在所难免的小冲突，打几枪，伤亡个把人，十三世达赖、边觉夺吉等人起码不至于紧迫到连家都不回一趟地星夜出逃，形势毕竟还没紧张到这种程度。更大的可能是，如果自己无牢狱之灾、性命之虞，他们是不会太在乎拉萨街头响一阵乱枪、死几个人的，更不会因此放弃自己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而狼狈出逃。毕竟，十三世达赖刚与英人修好，英方并没对他有过什么承诺。事态的发展也说明，英国政府对十三世达赖等的突然到来措手不及，并在权衡利弊后，训示英印政府在中国政府与十三世达赖的冲突中持"中立"态度，流亡英属印度的十三世达赖一度被打入冷宫，处境颇为尴尬。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英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在西藏推行以"政教分离"、"收回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政，引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不满并发动对抗清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其直接原因是，叛乱失败后，驻藏大臣联豫捉拿十三世达赖以下的首恶分子，遂使十三世达赖携其亲信星夜出逃。

本文所陈明的观点与以往论著对于十三世达赖逃亡英印事件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笔者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予以批评指正，以期弄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推动西藏历史研究的进展。

---

①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325。

②《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1305—1306。

③《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1305。

④《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1317。

⑤⑦《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1303。

⑥伍昆明：《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民族研究》，1999年第一期，页81—90。

⑧《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页1304。

⑨《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页1308。

⑩《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页1318—1319。

⑪《张荫棠驻藏奏稿》，《清代藏事奏牍》（下），页1317。

⑫《查办事件大臣张荫棠收回政权经营西藏条陈》，

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页167—168。

⑬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1558。

⑭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209—210。

⑮《张荫棠驻藏奏稿》，页1307。

⑯《张荫棠驻藏奏稿》，页1314。

⑰《张荫棠驻藏奏稿》，页1365。

⑱［英］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页288。

⑲［英］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页289。

⑳［英］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页290。

㉑《西藏僧俗官员弁禀请撤回赵尔丰以堵糜乱》，见《川滇边务档案史料汇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216。

㉒《张荫棠驻藏奏稿》，页1444—1445。

㉓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216。

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理藩部文件。

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理藩部，第638卷，第2号文件。

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理藩部，第638卷，第3号文件。

㉗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585。

㉘［英］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页291。

㉙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29。

㉚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596。

㉛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06。

㉜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16。

㉝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08。

㉞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07。

㉟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11。

㊱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08。

㊲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页226。

㊳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17。

㊴［英］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页292—293。

㊵［英］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页293－294。

㊶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17。

㊷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页1633。